

HONEST
OFFICIALS
OF CHINA BOOKS

锐

吏

王安石

Honest Officials of China

张宏杰 / 著

·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权力的使用上，古往今来有种种模式——有人用权力换取个人的名誉、地位、财富，有人用权力为更大多数的人谋求利益，有人用权力交换权力，有人用权力质疑权力。权力简直就是魔杖，它在不同的人身上竟体现出种种不同的效力。

辽宁画报出版社

锐吏王安石

.....
HONEST OFFICIALS OF CHINA

• 中国廉吏丛书 •

作 者——张宏杰

总策划——李 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锐吏王安石/张宏杰著.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1. 9

(中国廉吏丛书)

ISBN 7-80601-433-0

I. 锐… II. 张… III. 王安石(1021~1086)一生平事迹
IV. B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918 号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 284 千字 印张: $9\frac{7}{8}$

印数: 1—3,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姚铁军 张东平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李 然 黄 哲

版式设计: 李 然 黄 哲

定价: 24.80 元

谨记 Reme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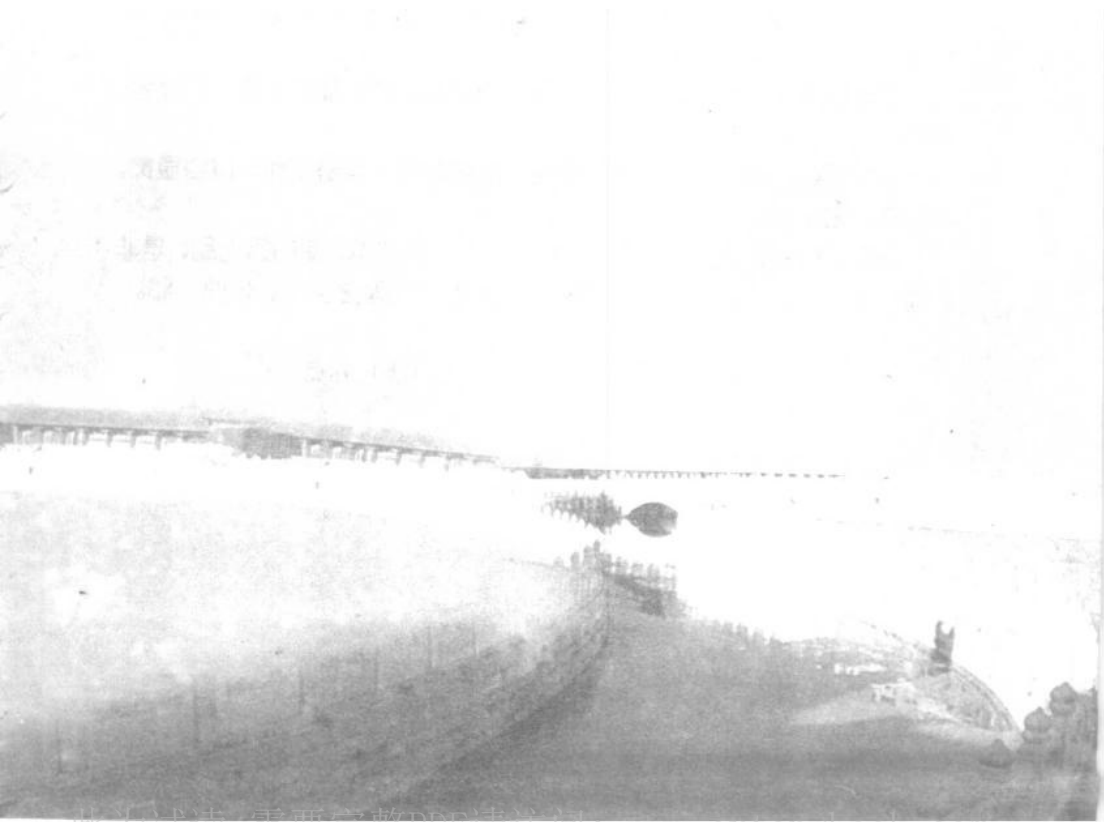
林则徐的一句话

廉吏不可为，
廉吏不可为而为之



谨记 Remeber 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

一个人一经获得了某种政治权力后，更引人注目的显然不再是获得这种权力的过程或性质，而是如何对待和使用这种权力。在权力的使用上，古往今来有种种模式——有人用权力换取个人的名誉、地位、财富、有人用权力为更大多数的人谋求利益，有人用权力交换权力，有人用权力质疑权力。权力简直就是魔杖，它在不同的人身上竟体现出种种不同的效力。



古人六邪之论

六邪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诋，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

——【唐】赵蕤《反经》

古人九虑之说

九虑

桓范曰：“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台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南北朝】桓范《世要论》

中国廉吏丛书编委会

主 编：金 河 姚铁军

副主编：张东平 马清福

编 委：金 河 姚铁军 张东平
邓荫柯 邢和明 马清福

廉吏不可为而为之

金 河

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来统治的。历朝历代，总有两种官最引人瞩目：一种是清官，一种是贪官。为官不贪不占，不徇私受贿，虽然与政治抱负、行政业绩不是一码事，但是当官的如果手脚干净，不使赃钱，腰杆就硬，就不须迎合一些权贵的不合理要求，就有条件秉公处事，不干浑事，不干昧良心的事。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创造出一些不平凡的业绩来。例如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海、魏征、宋朝的王安石、范仲淹、包拯，元朝的耶律楚材、明朝的于谦、况钟、海瑞、清朝的于成龙、林则徐、沈葆楨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廉吏。他们都是在历史上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廉洁也许并不是他们最主要的特征，但却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他们做人为官的最低标准，也是他们建树伟业的牢固根基。他们两袖清风，纤尘不染，傲视金钱财货，淡漠感官享受，胸中激荡着为君国为黎民牺牲奉献的浩然正气和追求人格纯洁完美的磅礴激情。读者通过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廉吏丛书》可以很好地认识和了解几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廉吏。

在迈入新世纪、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明显加快的时刻,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义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进行到底。”为了解决好这个关系到执政党存亡,关系到四化建设成败的问题,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要深刻认识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监督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依照党纪国法履行职责,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他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我们还要进一步强化对领导干部经济犯罪的查处力度,毫不手软地查处大案要案,不管是谁,不管他职位多高,一旦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处理。党内不容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

要使我们反腐倡廉的工作取得理想效果,光抓管理与法制这一个方面还远远不够。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制,必须双管齐下。”教育与德治的问题,这是和管理与法制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抓教育,当然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我们党的共产主义理想,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去武装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用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优秀人物和先进事迹去激励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其中廉吏的业绩和传统就给我们以鼓舞,激励和可借鉴的经验,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这些廉吏都是孔夫子的学生。他们确实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首先,这些廉吏都有坚强的精神支撑。人的精神支撑就是一种理想追求。尽管因为时代不同所处环境不同,每个人的表述不同,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概念来概括,但他们所追求的都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也不是一般的光宗耀祖,而是无愧于士林,是“报效国家”,“报效朝廷”,是国家的前途,百姓的安乐。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集中而鲜明地表达了这和信念和决心。

第二，他们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或者亲身感受过普通老百姓的苦难，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希望在现存制度下尽量减轻百姓负担，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尽量为这个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伸张正义，为此不惜冒与某些利益集团发生冲突的风险。

第三，他们都极珍视自己的声誉，认为士大夫如果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去夤缘攀附，行贿送礼，是非常见不得人的事，而贪赃枉法聚敛财富，更为士林所不齿。他们凭良心做事，堂堂正正，淡泊高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人一世，无愧于千秋。在他们身上总能让人感到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第四，在宅居、餐饮、穿用、器物、车马等私人消费上，他们都崇尚简素，鄙视奢侈。他们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信条永不放弃理想，严格遵守传统的首先规范。他们认为以奢华相攀比，是一种腐败亡国的征兆。不义之财，取之易，去之轻，最后总没有好下场。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持之以恒的自我约束。中国封建社会是最典型的人治社会。法律的简单疏陋给管理贪脏受贿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尽管也有监察官吏行为的专门机构，也有一定的举报制度，也不乏严厉处分贪官的纪录，但是封建特权与贿赂公行早已使这种监督制度行同虚设。在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下，廉吏的产生就不是制度的产物，也不是管理的结果，而是一官吏自我约束的结果，是精神力量的强大作用。儒家的传统学说中就要求人“正心”，“修身”，进而“齐家”“制国”“平天下”。要时刻对照儒家经典，对照先贤典范进行自我省视，从而全面达到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约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德治。不但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亲友和部下。

这些廉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廉政建设中，在加强管理与法制的同时，不可忽视精神的作用，不可忽视德治。江总书记说：“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

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党有自己的政治优势，有长期思想教育的经验，我们的德治也会产生封建条件下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为此我们也有理由对党风和廉政建设抱有信心。

其实，《中国廉吏丛书》所传述的历史人物，有的善于谏言谋面，有治国安邦之策，为一代名相；有的讲究实干，有经世济民之才，为一方大吏；有的秉公持正，不畏豪强，为老百姓伸冤解困，为万众景仰的清官；有的临危受命，浴血奋战，抵御外辱，保卫了祖国和人民，为民族英雄。他们以各自的历史功绩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与称颂。传记的作者们用饱满的激情和鲜艳的笔墨描绘出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历史人物形象，读来颇为感人。作者的笔墨重点也许没有放在他们如何清正廉洁上，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更全面更准确地描绘、论述他们不朽的历史功绩，再现他们或廷诤面谏，或运筹帷幄，或勤于公事，或平决冤狱的那些动人场景。可以这样说，不廉洁者绝不可成为彪炳千秋的伟人，而只做到清廉缺乏特殊的才智勇气只不过是一名平凡的好官。希望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干部能从这套书中吸取力量、智慧和经验坚持连接标准，建树更光辉的功业，而那些已沾染上肮脏铜臭临近深渊边缘的人知耻而悔悟，回头是岸，而广大读者当能从这些伟大光荣的业绩和风采中深受鼓舞，增强民族自豪感，更加奋力拼搏。在新世纪创建新的功绩。

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 （代序）

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复杂更受争议的人了。从政治操守来看，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被列入清官廉吏之内。然而，清官廉吏仅仅是王安石诸多侧面中的一面。用清官廉吏来概括王安石实在是太不够了。不通世故的政治家、最著名的改革家、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标新立异的文字学者、素养深厚的佛学居士，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为王安石做一部传记。然而，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不可避免地最终涉及这个人的其它侧面。因为，只有把这些侧面综合起来观察，才能最终看清楚这个人。

不论如何，为清官廉吏王安石立传是件很有必要的事。因为，在为写这本传记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个性的政治家、最有胆量的思想家的生平，竟然这样不为人所知。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我找不到一本像样的王安石传记。这个为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其实是中国人最为陌生的名字之一。生前不被人认同，身后几百年来，王安石同样不为人们所理解。

是的，自从王安石执政以来到现在九百多年来，怎么样评价他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难题。从性格和气质来讲，王安石特立独行，言行一致，敢作有为；从道德操守来讲，王安石志行高洁，一尘不染，皎如冰雪。然而，从王安石的政治实践来看，他却是那样地离经叛道，

提出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异端言论，并且推行了一整套让人无法理解的改革方案，搞得“天下大乱”。这样一个人，到底应该被列入君子之列，还是应该打入小人一党，这个难题让无数学者痛苦不已。几百年来，对王安石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之相左，竟有天壤之别。

王安石还没有执政的时候，对他的评价就大相径庭。那时候王安石文名传遍天下，却屡次拒绝升迁，而甘愿做个地方小官。有人说此人志行高洁，“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对王安石寄与高度期望，认为他就是当世圣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解决当时困扰朝廷的诸多问题。可同时有人说王安石言行不同常人，必是沽名钓誉、大奸大恶之辈。也有人说他“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

在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如日中天，取得初步成效之时，神宗皇帝对他的崇拜达到了顶峰，竟当众称他为“今之古人”。这在崇拜上古的古代，可不是个一般的评价。然而，他的政敌司马光却气急败坏地称王安石“妄生奸诈，荧惑圣上，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背常法，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嗇夫之辨谈，诘塞净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简直就是说王安石是个想谋朝篡位的大奸臣。

王安石去世，政敌司马光当政，学生故旧无人上门吊唁，惟恐为自己带来不利，身后非常凄凉，“恸哭一声惟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然而，他的政敌司马光却大度地主张朝廷应该厚礼安葬：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伏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在此之后，大宋朝廷为评论王安石更是争论得天翻地覆。宋徽宗时，被后人目为奸臣的蔡京当政，大张旗鼓地抬高王安石，追封王安

石为“舒王”，并在孔庙中给予“配享”的崇高地位。然而，到了宋钦宗时，朝廷又取消了“舒王”的称号，罢了他的“配享”。南宋之时，王安石更被指责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天下之恶全部归罪于他。

自此之后，几百年间，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成为历史主流声音。《宋史王安石传》对他是完全的否定，明朝正德年间的状元杨慎则把王安石列为古今第一小人，朱熹、黄宗羲、王夫之等大学者也纷纷指责王安石变乱天下，祸害人民。特别是王夫之，对王安石简直是恨之人骨，称为民贼。经俗儒村夫递相传承，王安石大奸大恶的形象渐渐成为历史上的固定形象。然而，在否定中还是有疑惑。

王安石去世之后几十年，大儒朱熹的学生问：“万世之下，当如何品评王安石？”

朱熹说：“盖介甫是个修饬孝谨之人，论来介甫初间极好，他本是正人，见天下之弊如此，锐意更新之。可惜后来立脚不正，坏了。”

学生又问：“莫只是学术错否？”

朱熹回答道：“天资亦有拗强处。”

学生说：“若学术是底，这样天资却更有力也。”

朱熹深深地点了点头：“然。”

毕竟是大儒，朱熹没有对王安石全面否定，然而，对王安石如何品评，他的答案也是矛盾重重。

到了近世，王安石才被人重新认识。梁启超对王安石推崇备至，认为他几乎是古今第一完人。到了建国之后，王安石的身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的推崇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安石成了伟大的改革家、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唯物主义者、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历史进步力量的化身，并且因为列宁的著名评价“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而身价百倍。

事实上，王安石身上所有的“光荣”与“罪恶”，都是来自他那特殊的个性。他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真正有胆量、有见解的人，绝无仅有的不以别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听从自己内心声音的人，绝无仅有的站在“圣人”面前而不是跪在“圣人”面前的人。他是最有个性

的政治家。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个清官廉吏都是有个性的人。因为做清官廉吏就意味着拒绝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只有那些敢于坚持自己内心标准的人才能成为清官廉吏，而他们的代价就是被他人所攻击，所排挤，被官僚群体所厌恶。清官廉吏大多是孤介之士，生前艰辛而死后留名。而王安石的个性、孤介则绝不仅仅表现在清廉这一方面，而是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印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侧面，而他的个体生命又是这样有力地介入了北宋社会的大变革，这也就难怪他生前身后被绝大多数人所攻击所排挤所诅咒所污蔑。他是历史上最孤独的人，不但身后没有多少人理解他，在他生前，保守派官僚视他为怪人，在他改革派的同事之中，也没有自己真正的同道。这些和他共同扛起改革大旗的人，多数不过是为了找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而利用他而已。

封建社会是最不能容忍个性的。王安石这样的人在那样的社会居然能生存下来，并且切实地推行了自己那离经叛道的变法主张，使这个陈陈相因的社会这样大面积地被惊扰，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这完全是他个性超乎寻常的强悍、自我竭尽全力的张扬所致。虽然他最终是失败了，但已完全可以被称作光荣的失败。是的，他是那个缺乏个性、缺乏创造力的时代为数不多的骄傲之一。试想，在孔子及其庸俗的解释者统治中国思想界千余年之后，谁敢像王安石那样把前人对经典的解释全部推倒，别出新意地加以重新解释？在一个崇拜先祖信服天命的社会，谁敢像王安石那样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谁有王安石那样的眼光和魄力敢于推行一场彻底打乱社会现行秩序的带有国家主义和现代商品经济意识的变革？

王安石的特殊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他出生的年代，社会思想空间还没有被皇权所彻底封闭，人们还有一丝精神上的呼吸自由。就是这一丝自由，成就了独特的王安石。王安石的家庭也是个特殊的家庭，他的父亲王益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体罚孩子的家长，对王安石的阅读学习也基本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安石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把自己的思想地基大大扩展，

并且对汉儒的注释产生了怀疑。从精神导师孟子那里，他汲取了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正和自己坚定固执的个性相契合，并坚守终生。在现存的王安石最早的一篇文章，作于二十二岁的《送孙正之序》里，他这样写道：“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然而，君子也。已然然而，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意思是说，时人认为对，自己也就这样做，是庸人，自己认为对才去做，是君子。君子在艰难困苦中，也不肯放弃原则，取宠于大众。这样的人如果被天子所用，治理好天下易如反掌。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正是按照自己的这些话去做的。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他最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他一再批评神宗皇帝意志不坚定，易为种种流言所动，而他自己则确实是不问成败，一意孤行。虽然他的自信达到了固执的程度，并且成为他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坚定自信对我们这个群体自大而个体不自信的民族来说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管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王安石的改革事业做何评价，王安石的个性永远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独特的闪光点。所以，在清官廉吏传的选题中，我接受了其中王安石一册的写作。然而，由于时间的过于仓促，由于准备非常不充分，由于自身学养能力有限，这本传记实在难以让人满意。但如果它使你开始对王安石这个人物产生一点兴趣，我的目的也就部分达到了。